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军事战略编 专题二

徐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 对华战略与谋略

〔日〕芳井研一 / 编 宋芳芳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专题编者

〔日〕芳井研一

社会学博士，日本著名史学家，曾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人文学部部长、教授。主要著作有：『環日本海地域社会の変容 — 「満蒙」・「間島」と「裏日本」 —』（青木書店，2000），『近代日本の地域と自治—新潟県下の動向を中心に』（知泉書館，2008），『柳条湖事件への道：平和と戦争のせめぎあい』（高志書院，2010），等等。

译者

宋芳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日本研究等。主持及参与课题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中日文论文 20 余篇。

专题解说

〔日〕芳井研一

前言

本文旨在依据一手史料重新探讨亚洲太平洋时期日本对华战略的发展过程。

日本见单独结束日中战争无望，便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际结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实施武力南进，闯进了日英荷战争。本文的第一个课题是，通过1941年阶段的战略问题探讨日中战争的泥沼化为何导致了日英美荷的开战。

第二，探讨1942年重庆作战的计划及其流产的过程、实施浙赣作战的意义。继首战之后探索重庆作战的经过，从中揭示日本战略决定过程的问题点。

第三，重新探讨1943年末至1944年所实施的大陆打通作战^①之开始及其真相。问题点是为何陆军没有在对美正面作战中投入主力。

它最终以导致战后东亚冷战起点的形式，归结于日本的战败。考察美国、中国和日本在日中战争末期围绕终止战争的争执成为第四个课题。

日本战略、战术的决定过程，是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天皇制机构之下运作的。天皇受内阁阁僚辅助，是治国理政的最高责任者。陆海军的军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在预算之外，是独立于内阁的组织，由天皇直接总括之。陆海军决定战略之际，军部据统帅权独立这一制度掌握着较大权限。但这并非绝对的，他们也要与直属于天皇的内阁或枢密院、宫中等其他组织保持妥协。因此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来决定

^① 大陆打通作战，日方正式名称为“一号作战”，中方称之为“豫湘桂会战”。——译者注

战略。

制定战略方案的陆海军参谋层作为支撑天皇制机构的官僚，是参与其运作的专业集团。他们拥有权限，但其常常是从军事专业领域出发思考的。在国际形势的分析上当然也是军事视角优先。政治的、外交的判断虽然也影响战略决定，如东条英机的政治影响力是因首相的地位，但若无天皇的极大信任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这种情况，于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内大臣及枢密院议长等也同样如此。军部实施战略之际必定要上奏天皇获得批准。在这种天皇制机构的组织结构中，能够设定战略前提条件的，是包含中坚幕僚在内的军部的专业官僚，从中可以看到中坚幕僚作为天皇制机构运作者的政治立场。在以下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战略决定过程的分析中，有必要以此种天皇制机构的框架为前提进行探讨。

近几十年间，亚洲太平洋时期的日中战争相关资料的可利用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刊行的1960年代至1970年代，《现代史资料》《杉山笔记》《败战的记录》等基本资料相继以铅字的形式付梓。但在这个时候能够阅览的资料还是有限的。^①其后，1983年以《续现代史资料4》的形式出版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日志。1998年出版了大本营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志》等。抽稿所研究时期的重要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②进而2001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开设，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外务省、防卫省和日本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相关资料，因此可以足不出户地阅览此前只能前往各个资料收藏机关才能获得的庞大资料^③。截至2013年4月，该中心共收录了约180万件、约2600万幅图像的资料，其后仍在逐步增加中。但是大部分个人赠送的档案必须前往资料收藏机关阅览的状况没有变化。《田中新一中将业务日志》和《真田穰一郎日记》等本研究的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7卷（日米開戦）。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第4卷（太平洋戦争Ⅰ）、第5卷（太平洋戦争Ⅱ）青木書店、1972。『現代史資料』第8～10、12、13卷（日中戦争1～5）みすず書房、1964～1966。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上・下巻、原書房、1967。参謀本部蔵『敗戦の記録』原書房、1967。

② 『続・現代史資料4 陸軍』之『畑俊六日誌』みすず書房、1983。以下简略记为『畑日誌』。大本营陸軍部戦争指導班『機密戦争日誌』上下巻、錦正社、1998。

③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

重要资料必须在防卫省战史研究中心阅览。该中心所收藏的井本熊男日志等因不公开而不能阅览。美国所归还的陆海军档案多数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了，但仍有一部分未公开。陆海军档案也有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拙稿在此资料公开情况的基础上，拟对前文所示的课题依照时间顺序进行探讨。

一 日中战争与日美开战

1. 日中战争的持久化和南进问题

首先探讨作为亚洲太平洋战争重要一环的日中战争与日美开战是怎样相关联的。日本陆军对日中战争的泥沼化负有直接的责任，其解决方案的制定也被委托给陆军。因为在统帅权独立制度之下军部负责战略，参谋本部等军部以外的机构不能介入战略、战术的制定。在参谋本部负责战略的核心部门是第一作战课。因此下文利用当时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的业务日志等资料，通过追寻该部门直至1941年12月8日日美开战时的想法，思考日中战争与日美战争的关系。在《赫尔备忘录》中，美国以日军从中国撤兵和否认汪精卫政权作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因此日本最终决定攻击珍珠港。因为伪满洲国的维持、在中国的驻军等是日本不能妥协的条件。日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结束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新开始的冒险性的战争，其发端与日中战争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下考证之。

首先梳理1940年的日中战争和南进问题的经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39年12月，日本陆军打算实施修改的军备扩充计划。将分布在中国大陆的85万人的兵力减少到50万人，想要将节省的35万人份的财力用于对苏作战的军备扩充。但在第二次近卫内阁决定了武力南进政策之后不久的1940年8月2日，八路军40万人在华北发起了百团大战。日本失去了从中国战场撤退兵力的余力。日军方面的损失因游击战而扩大了。日本陆军越发丧失了结束日中战争的希望。

1940年11月13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其内容显然与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所决定的优先向南方武力进驻的《处理时局纲要》的方针——“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政治策略和战争

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调整日苏邦交，竭力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为此决定“特别应该充分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有所不同，改变为不以武力南进，而是通过谈判实施南进。^①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满铁调查部东京支社调查室的尾崎秀实所观察的以下几点。即日本虽期待通过三国同盟的缔结，与重庆政府进入通向全面和平的决定性阶段，但实际上演变成了美国通过寻求重新开启缅甸路线和借予巨额新借款等措施积极对华援助；^②但仅此原因是无法解释的，原因还在于，屋漏偏逢连夜雨，欧洲的战况没有如愿发展：作为《处理时局纲要》和缔结三国同盟前提的德国发动的英国本土登陆作战受挫，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将登陆作战延期到第二年。

这种新形势下，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认识到必须修正对南方^③行使武力的方针。此前设想单独与英国进行的战争，此时接受了海军所主张的英美不可分论，转换为南进之际不行使武力的方针。^④田中命令部下在12月15日前制定《大东亚持久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持久作战指导纲要》。在1941年1月12日召开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两个方案。

问题是田中在这个时期对军事、政治形势的认识。在解决日中战争的前景黯淡、武力南进案撤回的情况下，还剩下的选择项为什么要基于德国在欧洲战线的军事胜利呢？这一疑问萦绕到最后。实际此时田中的希望始终是为了德国的胜利之日，想要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势力圈（“大东亚新秩序”）。

时机既然不成熟，前景自然也无法预见。即便如此，田中还是将“法属印度、泰国作为南方施政的第一阶段，日、满、中、法属印度、泰国作为大东亚的骨干”，制定了在“昭和十六年、十七年度间大概建成”“这个骨干建设”的构想。当然，解决日中战争正是“首要关键”，为此形成了一个逻辑，即为了

①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上巻、原書房、1967、第139～154頁。本专题在引用含日志类在内的原始资料之际，适当地将片假名改为平假名，增加了标点符号。另外（）内的记载是手写。引用资料之际中途省略的时候，记为“（中略）”。

② 尾崎秀実「三国同盟成立後の新情勢」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東京支社調査室『東京時事資料月報』15号。另外，该资料见本人编『東京時事資料月報』（不二出版、2011、影印出版）第政-5页。

③ 即东南亚。——译者注

④ 田中新一著·松下芳男編『田中作戰部長の証言』芙蓉書房、1978、第65頁。

削弱英美对重庆政权的支援效果而有必要实施南方作战，在此基础上田中形成了田中特色的“大东亚新秩序论”。^①

2. 日美谈判与日中战争

怎样应对阻碍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美国呢？寻求处方的是这个时期正在推进的日美谈判。以下将田中部长所持认识与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的认识，随日美谈判开展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为缓和日美的对立，野村外相与格鲁驻日大使进行了三次会谈，但是未能缓和美国对日的态度。美国以日本遵守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作为前提条件，要求日军从中国大陆撤兵。在这种状况下，与重庆政府决裂的汪精卫政权与日本于1940年11月30日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但是正如满铁调查部东京支社调查室一针见血的分析，即便通过汪精卫政权开展全面和平运动，即便是德国等第三国进行调停，火速解决日中战争也是困难的。东京支社调查室成员的共识是，日中战争并非独立的战争，它已经“与以欧洲大战为中心的世界形势具有密不可分的性质”。^②这种认识下，尾崎秀实关注日本国内政治中由亲英美派所推进的反击，对日美谈判的推进寄予希望。^③

田中部长也强烈认识到日中战争已经具有“与世界形势密不可分的性质”。可以说，关于日中战争的认识，田中与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其解决方案，并非第二次近卫内阁、尾崎秀实所期许的日美谈判，而是沿着南北并进论来描绘，即为确保“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和实现对英美战争的能力而推进南进，以及以苏德战争开战作为契机而北进。为什么呢？因为田中认为在英美苏和中国共产党相互牵制的状况下，日本和重庆政权的和平谈判没有进展，最终只有依靠德国打破现状。看一下《田中新一中将业务日志》1941年3月18日条的记载即可明了。

①蒋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决心依靠英美，若不需要多加考虑苏联的态度，就决心打倒共产党（对依靠英美有自信）。

① 田中新一著·松下芳男編『田中作戰部長の証言』第67～68頁。

② 海江田政孝「日支条約の調印と列国の態度」（『東京時事資料月報』17号）第列-8頁。

③ 尾崎秀実「現状維持勢力下の一時的安定と最近の政治情勢一般」（『東京時事資料月報』18号）第政-9頁。

②苏联希望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化和日中纷争的永续。若因共产党的发展而导致蒋介石对与日长期作战绝望就麻烦了，因此应该在不使蒋介石放弃战争的程度控制中共。蒋应该掌握了苏联的这个意图，故压制共产党，不使其太过火。特别是作为一石二鸟之策，将其驱赶到华北、“蒙疆”及满洲应该是蒋最希望的事情。

③共产党希望战争长期化获得共产化之实。蒋虽知此意但无法下决心（与日）和平，畏惧和平后共产党的发展。和平的同时如果不能决定是否用实力坚决消灭共产党，则不能回应和平。因为他预料此种压制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

④若以中苏邦交恶化为前提，蒋必将事前拉入英美特别是美国，若非如此则不能开始求和。作为蒋而言，无论是继续抗战，还是求和，强化依靠英美是当前的急务。

⑤蒋即便采取上述措施希望和平，英美也不允许。唯恐日本的自由行动。

⑥蒋深知战争长期化最终将导致共产化，带来不利，但不能求和，被英美强迫抗战之外别无他法。

⑦促进国共摩擦的激化，使蒋对抗战绝望之外别无他法。

⑧蒋应有考虑在战后的复兴中利用美国。

⑨蒋认为和平除美国“路径”之外别无他法。谋求德国“路径”的复活。

⑩国共摩擦激化，日苏调整。^{①②}

但日军在中国战线的损耗严重。如业务日志 1941 年 3 月 29 日条中，在“第二部部长”之项中记载着“武器有问题。火 A、我方车辆（四成不能使用）没有修理零件（武昌二联队）”。^③ 鉴于这种情况，此时田中认为，当前只有避免与苏联的纷争，推进进军南方。松冈外相自柏林归国之际到莫斯科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是在 4 月 13 日。可以说松冈的行动正如田中所想，但他并非没有假设对苏作战。

实际上田中留意着日美谈判的进展，同时在 4 月 23 日的业务日志中留下了如下“德苏战争开战之际帝国应该采取的措施”。

① 「[1941年]3-18 国共問題」『田中新一中将業務日誌』第 307 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以下略记为『田中日誌』。

② 著者引文时依据史料格式有分段，翻译时取消了分段。特此说明。其他部分不再一一说明。——译者注

③ 『田中日誌』1941 年 3 月 29 日、第 328 頁。

①鉴于德苏关系恶化的倾向，迅速解决掉支那事变，有效牵制苏联。强化三国同盟。

②为解决支那事变，以召开日美会谈作为手段，经此日美会谈在支那事变解决后，发现日本对美具有特别的牵制力量。这是使得美国不可能参加欧洲战争的原因。

③美国参战后，日本不会受日美会谈约束。

④在德苏开战时先以解决支那事变为紧要，要尽可能保持日美友好，防止苏美接近。

⑤日中军事同盟

中国满洲的安定处理、亚洲西南部的处理、确保南方。^①

即便在这个时候，田中认为“南进”论另当别论，为了德苏开战和日美谈判的进展，有必要早日解决日中战争，但是他依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认为与重庆政权的和平还很遥远。畑俊六担任过军事参议官，于1941年3月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南京赴任，在3月27日条的日记中，记载着“到去年七月左右为止，重庆也是相当消沉的模样，因日德意三国同盟而致英美对华援助，据此心存抗战之意。因此如汪也认为其与重庆的和平绝对行不通而放弃了。他的口头禅所谓全面和平意味着与重庆合并，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②。关于松冈外相主持的重庆工作在4月9日条记载：“田尻参事官来访，他于去年十一月成为惯例的松冈工作的责任人，在香港工作……据该人的言论，重庆工作现在完全绝望了……因受制于美国而最终和平无望，其意见是强化汪政权之外别无他途”。^③6月28日条记载：“本年夏秋之际，与中央充分协议，要综合武力、经济力、一切的战力，为使重庆屈服进行最后的努力，前些天派第一课课长及作战主任赴东京进行了协商，因此会同甲、吕、登集团参谋长及波集团参谋长，由总参谋长主持，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进行了充分的协商”。^④畑赴任后打算对重庆政权施加军事压力。但是

① 「[1941年]4-23 独「ソ」開戦の際帝国の採るべき措置」『田中日誌』第361頁。

② 『畑日誌』1941年3月27日、第289頁。

③ 『畑日誌』1941年4月9日、第290頁。

④ 『畑日誌』1941年6月28日、第303頁。

中国派遣军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自1940年9月起担任中国派遣军参谋、1941年10月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员的吉桥戒三回忆到，在这个时期“虽一度探讨了重庆作战，但并未认真研究。畑（俊六。——译者注）……取代西尾寿造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后宫（淳。——译者注）……虽认为有吸引力，但并未具体化。”^①确实如此，与重庆政权的和平谈判连机会也没找到，日美谈判也没有进展。

3. 南北并进论和日中战争

以下依据《田中新一中将业务日志》探讨1941年7月2日加入了南北并进论的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的相关问题。如多数论者所指出的，这个决定成为迈向日美开战的重要一步。开始准备对苏作战的同时不惜对英美开战谋求进入东南亚，这种南北并进论的决定与日中战争的进展如何相关呢？对陆军而言，南方作战的目的是切断援助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物资流通渠道。因为它与对苏开战的准备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相重合，因此无论是军事还是财政方面都成为巨大的负担。关于这些问题，田中如何认识、如何处理呢？

首先是关于1941年6月22日德苏开战。如前所见，在4月23日条日志中，田中认为必须在德苏开战前先解决日中战争，认为有必要支援自4月16日起推进的日美会谈。但那个想法在5月26日的《南方作战下的支那事变处理》中完全改变了：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和平，而要采取长期战体制，“虽努力于事变的大体解决，但并非需要特别推进和平工作之事”，为确立长期战的态势，以封锁和航空作战为主。^②

田中在德苏开战7天前的6月15日所记《伴随德苏开战的措施》中，明确地提出开战后实施关特演的设想。即“察觉开战必至，安排增强满洲军备，引导在满师团，推进扩充人马”；“支那事变目前沿袭现在的方针，充实在满战备，开展南方活动，随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发动北进或南进。此时若有需要，从中国挪用兵力”；“可于九十月使用武力”，进而准备“真正的太平洋战争”，“需

① 「派遣軍關係參謀回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此处引用出自吉桥回忆。吉桥1940年9月至1941年10月担任中国派遣军参谋，期间，畑俊六取代西尾寿造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后宫淳取代板垣征四郎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引文意思为，吉桥在中国派遣军任职期间，中国派遣军并未认真研究重庆作战。

② 「[1941年]5-26 南方戦に於ける支那事变处理」『田中日誌』第417頁。

要把印度、缅甸、泰、马来、法属印度、荷属印度、菲律宾诸岛、沿海州、北桦太^①、堪察加半岛等掌握在手中”。^②

当然田中并不认为仅此就能结束日中战争。据德苏开战4天前的6月18日条的《德苏开战与支那事变的趋向》，“引起中国抗战之缘由的主体是英美，不仅可以预想到英美苏之间在远东的联系随着德苏开战更加强化，而且英美也相信自身形势的好转可让中国对我加以抵抗”；“因此若想促进支那事变的解决，除直接压迫中国本身之外，有必要强行阻断英美对华联系。为此，在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心之下，有必要采取措施：a)行使对华交战权，完全封锁、接收租界；b)封锁‘缅甸’；c)确保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若无此措施而期待中国的屈服可以说只是空想”，“然而这些措施必然导致美国的全面禁运乃至挑战，无论如何，不可避免要进入马来西亚、荷属印度支那”。从此可知在这个时候田中基本上预料到了其后的走向。^③

德苏开战两日后的6月24日，参谋本部以“八九月份时机到来”为前提，要求准备对苏战争。因陆军省军事课寻求“缩减战备”，其后围绕动员规模的对立持续着。25日条记载，以十六师团为标准，“五十一、五十七、军直一部的动员派遣”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26日条：以远东苏军的“综合战斗力减半为前提”，预期8月中上旬时机成熟，9月开战。^④

6月25日参谋总长会见天皇之际，对日中战争做了如下论述。“一方面，作为帝国，加强对重庆政权的直接压迫；另一方面，英美势力在背后支援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不断增加。为促进事变解决，可以认为极其有必要采取措施，打破英美势力与重庆政权的联系”。^⑤

以此为前提制定的《国策纲要》提交至同一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该纲要是以6月14日陆军省部商议的《伴随形势演变的国防国策》为基础的，加入了对德苏开战的应对和南方进出的内容。虽然陆军想要加入在南北两方向

① 即北库页岛。——译者注

② 「[1941年]6-15 独「ソ」開戦に伴ふ措置の件」『田中日誌』第525頁。

③ 「[1941年]6-18 独「ソ」開戦と支那事変の帰趨」『田中日誌』第544頁。

④ 「[1941年]6-26 对「ソ」作戰」『田中日誌』第581頁。

⑤ 「杉山メモ」上卷、第228頁。大本营陸軍部戦争指導班「機密戦争日誌」上卷、第123頁。以下简略记为「機密日誌」。

均以武力解决的表述，但海军唯恐以英美两国为敌，要求使用暧昧的表述。松冈外相在 27 日继续召开的恳谈会上“强调突然即时对苏参战”。^① 此后包含御前会议在内，松冈始终主张对苏即时开战、南进中止论。陆海军对此均表示反对。最终在 7 月 2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明确记载南北并进的《随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这份一边处理日中战争、一边进军南方想要“顺应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的纲要，认可了为准备对苏开战举行关东军特别演习和武力进入南方。这一“南北并进”论正是田中新一所计划实施的内容。

据 7 月 5 日的《机密战争日志》，参谋次长赞赏陆军大臣东条同意动员 80 万兵力的决定是“令人钦佩的”，因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在御前会议上陈述对苏作战准备的必要性之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该议长的“铜像应该树立在三宅坂”。^② 从 7 月上旬开始依次实施了关特演的动员。但关键的日中战争的解决前途未卜。对于田中的关特演说明，陆军大臣东条 7 月 31 日称“支那事变的处理最重要。不应该改变这个方针。……陆军在支那事变中损失四成……现在是最最后的为国奉献。24D 是计划。实际上应该减少”。^③ 但是德苏战争并没有像田中所预料的演进，远东苏军的向西调兵而导致的减员并没有那么多。因此在 8 月 10 日决定暂时中止关特演，南进和日美开战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

4. 日美即将开战前的对中国作战方针

以下讨论日美开战前的决策过程中对华作战方针具有怎样的意义。首先介绍尾崎秀实对关特演中止后的形势分析，然后将其和陆军大臣、首相东条英机和田中部长的判断进行对比。避免日美开战的可能性虽然与对美国的外交妥协相关，那么拒绝妥协的逻辑是什么呢？

关特演中止的相关状况，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的尾崎秀实整理如下。因中止了对苏作战的准备，所以对美协调成为国际形势中最为重要的课题，尾崎关注由第三次近卫内阁开展的日美谈判。因为日本维持经济命脉所必需的石油、铁屑或从美国获取，或从东南亚方面获取，这是不可或缺的。但美国要求日本放弃南进政策，在事实上从三国同盟脱离，再次确认英美在华的权益。接受这

① 『杉山メモ』上卷、第 245 頁。

② 『機密日誌』上卷、第 128 頁。

③ 「[1941 年]7-31 大臣との会談の件」『田中日誌』第 768 頁。

些要求是向英美屈服。日本的政治领导人面临着或向英美屈服以维持日本的国家生存，或者进入南方确保资源的二选一的事态。但迄今为止经过领导人的反复灌输，国民的意向是反英美的，即便领导人认为屈服于英美是合理的，国民也是不能接受的。尾崎在这个时候的判断是“战败后可能开始屈服”。^①南方问题包藏着战争的直接危机，第三次近卫内阁进入了死胡同。满铁的世界形势调查委员会认为，解决方法是只能接受美国所要求的日本从三国同盟退出，采取中立政策。^②他们的判断是，为了避免南北两方正面作战容易受到全面包围的状况，只有宣布中立。^③

但实际政策的负责者不顾这样的选择方案。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的《帝国国策施行要点》，决定越过7月2日的决定，以10月下旬为目标做好对美英荷开战的准备。

据10月14日条的《陆军大臣在内阁会议的说明要点》，陆军大臣东条严厉拒绝了美国主张的自中国撤兵，称那样屈服于美国的主张的话，之前日中战争的成果将付之东流，“满洲国”也危险，朝鲜统治也危险，在日中战争中的数十万战死者、数十万负伤士兵、数百万军队和一亿国民的辛苦、数百亿元的费用将全部化为灰烬。这就是硬要选择日美战争时东条的逻辑。^④

东条于10月18日成立新内阁，转向日美开战。在彼时，日中战争战略地位如何？据11月1日条的《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美谈判要点》“甲案……一、在中国的驻兵和撤兵问题 关于本条，鉴于美国方面（一）重视时期不确定的驻兵，（二）对于把驻兵包括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内有异议，（三）关于撤兵要求做出更明确的表示，可暂时不谈驻兵的理由，适当调整到如下程度：于实现日、华和平后的必要期间内，为日华事变而派到中国的日本国军队仍应驻扎在华北和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其余军队，在

① 尾崎秀实「緊迫せる国際情勢に旋回せる近衛内閣—第三次近衛内閣成立を中心に—」『東京時事資料月報』24号、第政-5～8頁。另外有关“关特演”，请参照拙稿「関特演の実像」（『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6号、2011年）。

② 満鉄調査部「欧州大戦と極東情勢」世界情勢調査委員会「昭和十六年度第一回報告：第一部総括篇」国立国会図書館蔵、第177～181頁。宮西義雄編著『満鉄調査部と尾崎秀実』影印刊載了全文，但对资料的页码重新编号了。拙稿中记载的是原稿的页码。

③ 同上、第182～183頁。

④ 『杉山メモ』上巻、第349～350頁。

实现和平的同时，就根据日华两国间的另行规定开始撤退，在两年内撤退完毕。（注）如美国方面对‘必要期间’提出质问时，可以这样应付：大概以二十五年为目标”^①。

在这种认识下，11月5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其第二章是“发动南方作战形势下的对华作战”。在南方作战首战阶段对中国作战维持现状，“与帝国海军合作大致保持目前的态势的同时，消灭英美等敌方在华诸势力，政治谋略加上努力对敌施压，期待蒋政权的屈服”，“南方作战发动后若有与俄国开战之虑，则适时将所需兵力调动至陆路及海路满洲方面”^②。南方作战的目标实现后，迅速再次整顿中国战线，准备对苏作战，这种方针是太过于乐观的预期了。以下在田中的工作日志中寻找这种预期所依据的认识。田中在11月27日条的日志中记有“美国的根本政策与上述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是根本冲突的。全面撤兵、否认满洲政府、否认南京政府、三国同盟成为空文是日本历史性的国策崩溃”。翌日（28日）记下了以下内容。

①在支那事变、南方战争的同时，成为即世界战争的历史性动向的一部分。

②因此要明确南方战争最终应扩大至对印、对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全面长期持久战争。

③在此历史的动向中根本性解决中国问题（日华共存共荣）之前不会有根本性的日华和平。但其间多有曲折，应变的方法毋庸置疑要灵活运用，以资于战争的实施。

④在国际上北方的问题也一定要随时机而动，亦同前解决之。

⑤国际的“新政”

谋求增进帝国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利益。国际的“新政”的实行当然需获得物质及人力资源利用价值较大的中国及苏联的援助。

⑥将来的形势判断

⑦与形势判断相符的国防对策

a)有关美国未来企图的判断

① 『杉山メモ』上卷、第378～379页。译文参照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6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92～394页。

称霸太平洋、获得远东基地，继续进行航空、通信的破坏战。

b) 欧洲战的持久

c) 帝国国防圈的确保

帝国持久圈的确保、帝国外围的确保。^①

田中将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定位于构成世界战争一环的“历史的动向”，认为为了推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不得不进行日美战争。因为日美的“根本政策”是正面冲突的。这一认识始终是田中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身份进行的军事层面的判断，但其内容远远地超过了战略、战术的选择范围，而是横跨日本的政治、外交等属于最高决策的事情。

日美开战的决策过程，正如既有的详细研究已展示的那样，充满了曲折。但从以上探讨可知，对于决策工作的中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而言并非那么复杂。简单说来，对于田中而言，任务是基于德国在欧洲战线的胜利，日本在亚洲创建“大东亚新秩序”。新秩序的范围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大陆、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印度。1942年1月19日签订的日德意军事协定所示的范围（德国和日本以东经70°划分防卫范围）是与之对应的。自中国战线僵持的1940年末开始，田中的伴随南进的“英美可分”论转变为“英美不可分”论。因此他形成了美国是阻碍新秩序建设的最大障碍的认识。在1941年的上半年他成为依据德苏开战的新事态倡导南北并进论的中心人物。近些年常被论及，御前会议等做出的南北并进的决定是妥协的产物。事实上并非如此，它是依据欧洲形势和美国动向的变化，为了适宜地做出判断而采取的如意算盘路线。

即便是在1941年下半年日美战争即将开始之前，田中判断的标准仍放在是否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上。他深信不如此便不能解决日中战争，这是田中思考框架的特征，虽然实际上为避免日美战争是有数种方法的。田中是军部中负责作战的中心人物，在1940年1月到1942年12月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时期，他以纯粹的军事框架作为基础，同时又是作为超越军事横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决定国家最高政策的实质性决策者而工作着的。

① 「[1941年]11-27 ハルノート」「11-28 研究」「田中日誌」第1109～1111頁。

二 重庆作战的摸索和浙赣作战

1. 重庆作战方案的再次登场

以下梳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初期作战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将重庆作战作为第二期作战的探索过程。依次探讨这些问题：为何在这个时期开始了重庆作战的设想？阻碍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浙赣作战的实施与之有怎样的关系？重庆作战的中止和1942年12月御前会议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有怎样的关系？作战规划的中心机构是参谋本部第一部，因此继续使用《田中新一中将业务日志》等为基础资料。

探讨珍珠港偷袭后中国战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波多野澄雄的《〈对华新政策〉的展开》。^①在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转换了政策，即南京国民政府加入轴心国参战，以此作为消灭重庆抗日所依据的名义，背景在于全局性战局的恶化和英美向重庆政权发表了取消治外法权声明。另外，其“内在推动力”是10月30日天皇的“御语”和驻中国大使重光葵的劝导工作。这样的解释在大的脉络中是得当的。但从处于此时战争指导中心的日本陆军所面对的问题来考虑的话，并不充分。

认为1942年末日本政府对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相关的军事形势，这种认识有些简单。不得不急忙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大量的陆军兵力的事实虽然使政府方针转变的时期提前了，但它未必是主要原因。以下依据史料进行探讨。

在日美开战不久后的1941年12月24日所召开的第77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决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联席会议决定的“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草案”，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

^① 波多野澄雄「对支新政策」の展開『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第77～101頁。